

第一章 夏商周春秋时期的史学

第一节 历史意识与中国史学的起源

一、史学的源头——原始的历史意识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时代后，到了文明时代才有了对自己历史的文字记录。但是人类对自己历程的思考却是伴随着自己的诞生便开始了，它随着劳动的发展而发展，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加强。于是它便构成了后世历史记录的最初始的前提，成了历史学的源头。这个源头，我们称它为原始的历史意识。

1. 原始历史意识产生的基础——“第一个历史活动”

思维意识是人类所独有的现象。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能够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即能够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

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劳动，改造着周围的自然环境，也促进着自身体质的进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同时造就了产生意识的自然基础——人脑。人类的意识正是人类对“第一个历史活动”过程的感知和认识。这样“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成了人类意识产生的源泉。

人类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时候，物质生产能力还极其低下，但人类已经有了思维能力，尽管这种思维能力与物质生产的能力一样还是极不发达的。当我们的先民进入氏族公社制的生活时，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不但保证了人类的生存与繁衍，而且使他们在进行物质生产之时，看到了一些自然现象与生产劳动之间的因果联系。为了生存与繁衍，他们必须将自己制作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的技能以及采集、渔猎的经验教训一代代地传下去。这种对生活、生产的经验、教训、技能的总结，实际是基于对以往历史总结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原始的历史意识。当这种历史意识与生产实践不断往复地结合时，人类社会则不断地前进着，而这一切都源于那“第一个历史活动”。

2. 从远古传说看原始历史意识的基本特征

尽管人类进入氏族公社大门，人们从事着原始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但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思维水平也十分低下。先民们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及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时常给自己带来的灾难，难以作出正确的解释，于是产生了一些神秘的想象，以为自然界不但有意志，而且有强大的力量；同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先民们希望自己强大，希望能征服一切为害于己的自然力量，也企盼这些强大的自然力量能为己所用——自然力被人格化了，于是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神的观念出现了。先民们用这种思维去解释人类所遭遇的一切，企盼着神来帮助他们战胜灾难，同时也用这种思维去解释和总结人类已经获得的一些成功，以便更好地生存下去。这些解释、企盼、总结便是一种原始的历史思维活动。这种历史意识的加强，促成了人类最初历史记事的产生——口述、耳闻（有时辅以结绳、刻木）、脑记，代代相传。这便是远古的神话传说。

我们从古代文献记载的一些远古传说中可以窥见到原始时代先民们生活、生产的一些面貌：女娲补天、燧人氏钻燧取火、神农氏教民农耕、大禹治水；先民们茹毛饮血、群居互助的艰辛生活；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习俗；原始部族间战争与融合，部落首领禅让等等。这些丰富多彩而又神奇美妙的远古传说，反映出原始历史意识的特征：其一，传说与生产、生活密切相连；其二，远古的英雄披上了神的外衣，呈现出神话的色彩。

先民们原始历史意识的这两大特征是并存的，它们巧妙地统一在同一个历史传说里，相安无事，因为先民的终极目的——为了更好地生存与繁衍——是相同的。

先民们的历史意识不仅反映在远古的神话传说里，也还停留在物化了的种种远古遗存中。如河南临汝出土的绘有《鹤鱼石斧图》的瓮葬陶缸，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河南濮阳西水坡伴有蚌壳龙、蚌壳虎图案的原始墓葬等。这些遗物中的各种动物图案很可能就是那一带氏族的图腾。图腾崇拜正是前面所说的万物有灵宗教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先民们把一些与自己生产、生活相关的自然物看成是自己氏族的起源

和保护神，也是原始历史意识的一种反映。

二、文字历史记述的出现——中国史学的起源

1. 文字、历法的出现——历史记载的重要条件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语言的载体。有了文字，口耳相传的历史才有可能演进成手写笔录的历史记载。文字虽然是历史记载的最主要条件，但记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还必须具有表达时间过程的计时系统，这就是历法。历法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立的计时系统，具体说来是年、月、日的安排。有了文字与历法，成文的历史便产生了。

我国很早就有了黄帝之史仓颉造字的传说。一个人发明创造文字的说法，自然不足取信，但说它是仓颉所处的那个历史阶段——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逐渐形成的，则是可能的。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西安半坡遗址的陶器上便出现了100多个30余种刻画符号。晚期的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还有比较规整的类似象形文字的图形符号。这些单独使用的符号还很难看出与语言究竟有何种联系。但当一种符号反复使用，经常与一定的语言概念相联系，逐渐有了固定的读音、含义时，文字就产生了。商代的甲骨文就是我们现在能认知的最早的成熟文字。它的不同单字约5000个，字形老练，至少出现了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等造字方法。这说明中国文字在甲骨文之前应当还有个漫长演进的过程。周代，又出现了刻在钟鼎彝器上的金文，它比甲骨文更加成熟。

随着原始农业、畜牧业的出现和发展，先民们需要判断季节变换以指导一年内生产的正常进行。人们逐渐发现比较可靠的依据便是天上的日、月运行的规律。太阳出没引起的变化，

月亮盈亏的周期性规律，使先民们逐渐了解它们与昼夜、气候、植物生长之间的关系，于是便有时间概念。人们最终创造出以日、月、年等概念来表述时间时，历法产生了。

在我国传说中，夏代已经制定出适合于农业生产需要的历法。《大戴礼记》保存的《夏小正》存有部分有关夏历的重要内容，春秋时孔子主张“行夏之时”^①，说明确实存在过夏朝历法。到了商代，出现了以太阳年和月亮盈亏相结合的阴阳合历历法。然而，月亮盈亏 12 次为一年，就比太阳年天数要少。于是每隔几年设置一个闰月，放在年末以调整与太阳年的天数之差。人们又用干支来表示“日”。

文字、历法出现后，历史记载的条件完全具备了，最初的文字记述的历史便产生了。从现存资料来说，甲骨文记载了迄今所知我国的最初历史状况。自然，甲骨文记载的最初历史，还远非系统、完整的历史记载。它们记事大多时间不明、彼此孤立，很难看出历史发展的脉络，但它们的问世表明：史学已经萌芽。

2. 史学意识

口耳相传的历史记事与文字的历史记录有所不同。口耳相传的历史记事是由人脑作为载体，因此所记历史内容根据不同个体的特点而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即所传承的历史内容具有可变性。但文字的历史记录则不同，它受到作为载体的文字的限制，已经记录下来的有关外部世界或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一旦“定型”，所传承的历史内容便产生了不可变性。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文明时代后，文字的记录权力把持在极少数人手里，他们代表统治阶级在做历史记录，因此也就必

^① 《论语·卫灵公》。

须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些记录者选择的历史材料乃至记述的原则、方法都有一些规定。这些规定最初也许是朦胧的，随着文字历史记录的发展而逐渐清晰与严格起来，这就是史学意识的逐渐成长。例如，《尚书·多士》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的记载，典册即载录礼仪制度及史事的典册，显然周朝人曾看到过记载着商朝先人取代夏朝这段历史的册、典，反映了商朝人重视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所具有的史学意识。保存在《尚书》里的《盘庚》篇，是史官对商王盘庚迁殷前后三次讲话的历史记录，虽然《盘庚》还称不上是完整的历史著述，但与《多士》相比，无论从内容或形式上，都反映了史学意识的发展。至西周初，这种对前代兴亡进行经验总结与思考日益加强，《尚书·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充分说明统治者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标志着中国的古代的史学即将诞生了。

第二节 夏商周春秋时期的史料构成

史料即历史资料，是历史编纂和历史研究使用的材料。从广义说来，人类社会在历史活动中留存下来的一切遗迹都是史料；严格地说，只有那些进入历史编纂和历史研究领域的遗迹才具有“史料”的资格。史料包括口述史料、实物史料与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也称文献史料，既包括史料汇编，也包括史学

著述，它们都是后代研究该时期的珍贵史料。^①

夏商周春秋时期的史料包括口述史料、甲骨金石史料以及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

一、远古时期的口述史料

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夏代之前的历史意识，只能依据口述史料，而这些口述史料现在只能从后世的一些文献中看到，^②这些文献大致成于商代之后到汉代，主要有：《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史记》、《韩非子》、《庄子》、《管子》、《商君书》、《淮南子》、《列子》、《吕氏春秋》、《白虎通》以及某些谶纬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口述史料往往以神话传说的形式来表现，而且在传承过程中又难免带有文明时代人们的加工痕迹。^③尽管如此，但仍能看出反映远古历史意识的某些情况。

夏代的历史由于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当时的文字记载，因此主要也是靠商周以后至秦汉时期的一些文献记载来加以考察。保存夏代历史情况的主要文献有：《尚书》、《史记》、《礼记》、《诗经》、古本《竹书纪年》、《左传》、《孟子》、《庄子》、《淮南

^①参见安作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本书每章所讨论的某一时期的史料构成，均是指该时期留存下来的史料，不是指后世编纂的该时期的史书（无论是正史、野史等）及对这一时期进行研究的著述，或整理出来的史料汇编等。我们认为，研讨中国史学史，不但要了解后人对某一历史时期进行研究而撰成的史著，更重要的是了解该历史时期究竟出现过哪些史料与史著，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

^② 远古时期的口述史料口耳相传，到文字产生后才被记录下来，因此我们只能从后世一些典籍来讨论远古时期的口述史料。

^③ 尽管后世一些著述会抄袭前代著述中的某些内容，但从所抄袭的内容来说，毕竟是属于远古时期的口述史料。

子》、《山海经》等。其中一些文献的记载已相当具体,如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记述夏代世系等内容比较系统。这些史料是后世研究夏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二、甲骨金石史料

所谓甲骨史料,一为甲骨实物,二为甲骨文资料汇编。^①

甲骨史料是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字史料,绝大部分出自殷墟,是自盘庚迁殷至纣王灭亡近 300 年间商王室贵族进行占卜的遗物。解放以后,山西、陕西等地也出土了一些周代甲骨。尤其是 1977 年陕西周原出土的 17000 多片周代甲骨,是十分珍贵的实物史料,目前已清理出部分有字甲骨。大致说来,自 1899 年发现甲骨文,到 1980 年为止,已出土甲骨共 15 万片以上(包括流落在日本、加拿大、英、美、德、俄、法等国的 26000 片)。^②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③,董作宾编《殷虚文字甲编》《乙编》及《外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小屯南地甲骨》等均有很高资料价值。

甲骨文的史料属于实物史料,它的史料价值极大,也十分可靠。它记载着商周时代的各种情况,如职官制度、阶级压迫与斗争、军事征伐、边远方国、宗教观念、思想风俗、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天文历法、医学科技

^① 按照本书体系,只讨论甲骨实物,但以后世编纂的著述作依据。重要的后世甲骨文资料汇编有:郭沫若、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全集》,李孝定主编的《甲骨文字集释》,岛邦男主编的《殷墟卜辞综类》等。

^② 参见安作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陈高华:《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一章第一节。

^③ 《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 1979 年起陆续出版,共 13 册,收录 14 万余片甲骨资料,对其中 5 万余片作了考释,极有价值。

等等内容。甲骨文史料还可以补充、纠正现存文献史料的不足和错误，或印证文献史料记载的可靠性。甲骨文史料与文字史料结合，成为我们研究商周历史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金石史料，是指以金、石为载体的文字史料，也是属于实物史料。金文指铸刻在钟鼎彝器上的文字，又称钟鼎文。商代青铜器制作已很发达，但有文字的很少。到了西周时期有铭文的青铜器越来越多了，且铭文的字数也逐渐增多。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已有文字 497 个。西周是金文史料保存最为集中的时期。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及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①等著述保存与考释了一部分钟鼎彝器，很有价值。

金文的内容多是西周贵族祭典、征伐、赏赐、盟誓、契约等情况的记录。从中可以了解西周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思想等多方面的史实。它与甲骨文一样，可以印证文献史料的真实性，补充或纠正文献记载的不足和错误。如 1976 年 3 月陕西临潼出土的青铜器《利簋》，记载了周武王伐商时，贵族利在牧野之战后受到赏赐的情况，铭文有“珣征商，惟甲子朝”记述，这就印证了历史上武王伐纣灭商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及《尚书·牧誓》篇所记“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可靠性。

著名的青铜器铭文有：《利簋》铭（32 字）、《何尊》铭（122 字）、《大盂鼎》铭（291 字）、《召鼎》铭（409 字）、《史

^①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全书 113 万余字，并有大量图片，对已经出土的战国之前的青铜器从源流、器形、文字考释、纹饰、青铜器断代、出土地点、价值等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墙盘》铭(284字)、《散氏盘》铭(357字)、《虢季子白盘》铭(111字)、《毛公鼎》铭(497字)等(以上均为西周青铜器铭文),《秦公簋》铭(123字)、《齐侯女壶》铭(143字)、楚《王子午鼎》铭(84字)、《蔡侯尊》铭(95字)等(以上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

石刻文字晚于金文。现存最早的是春秋时期秦国的石鼓文。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发现了10块直径约1米余、大小相同的被刻成鼓形的石头,上面用大篆书体即籀文各刻有四言诗一首。内容记述的是秦国国君游猎时的盛况,因此石鼓文又称“猎碣”。据郭沫若考证,石鼓文应为秦襄公八年、周平王元年(前770年)秦伐西戎送周平王东迁而凯旋时的记功之作。石刻在秦以后不断增多,但反映先秦时期的极少。

三、文字史料——《尚书》、《周易》、《诗经》、《春秋》、《周礼》

文字史料是关于夏商周春秋时期的基本史料,它比甲骨、金石史料更为丰富、生动、具体。商代虽然“有册有典”,有了自己的历史文献典籍,但它却没有流传于后世,而是到了周代经过周人的加工改写,保存在周代的文献史料中。周代的历史记载较之商代显然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国第一部历史档案文件汇编《尚书》就是在东周春秋时期最终编写成的。此外还有以记载卜筮方法、占卜吉凶为主要内容的《周易》,以崭新的编年史面貌出现的《春秋》,专述周代官制的《周礼》等等。这些历史文献有些还谈不上是完备意义上的史书,但的确保存了夏商周春秋时期重要的史实。此外,还有创作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并非历史典籍的诗歌总集《诗经》,它是文学作品,但也记录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情况的内容,因而也成

为研究西周春秋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这些文献极有价值，即使如《周易》这样的占卜著述，也包含着丰富的史实。《周易》简称《易》，又称《易经》，是卜筮用书，后列为儒家经典，共 12 篇，包括经、传两部分。经文由符号、文字组成。基本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重叠三个符号组成一卦，共有八卦。八卦两两相配，成六十四复卦。每卦有卦辞，说明卦义。卦辞后是爻辞，解释爻义。相传八卦是上古伏羲氏所画，六十四卦是周文王所作。一般认为《易经》形成于西周初年，作者应是卜筮之官。《易传》是对经文的解释，相传是孔子所作。但一般认为是战国至秦汉间人所作。《易经》卦辞、爻辞虽然大多表达作者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念，但也记载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内容，诸如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等，因此也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诗经》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 305 篇，包括风雅颂三部分，大致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①《诗经》中十五国风大部来自各国的民歌，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思想情感，雅（大雅、小雅）、颂（周颂、鲁颂、商颂）中记载了周族的兴起及周王朝的建立、兴衰过程，也记载了商周至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农牧业、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等情况，因此，它是研究商周春秋历史的十分重要的史料。

^① 据《文汇报》2000 年 8 月 16 日报导，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竹简发现《诗经》的佚诗 6 篇，也有一些诗的词句与现存《诗》有差异。因此有人推断孔子未删《诗》。竹简保持《诗》的原名为《讼（颂）》、《大夏（雅）》、《小夏（雅）》、《邦风》。其中讼、颂、夏、雅相通。而“邦”则是汉初避刘邦讳改“国”。

第三节 巫瞽、史官与史官制度

中国古代史官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已经难以考证清楚了。据说，仓颉、沮诵、大挠、隶首、容成、史皇都曾担任过黄帝的史官，不过这都难以认定。

中国原始社会中口耳相传历史，可能是由一些特殊的人来担负的，如巫、瞽等。巫是承担通天人之间关系者，瞽是盲人。前者可从商周史官也承担占卜之责可知一斑，而瞽为史官则有“瞽史之导”为证据。^①然而，巫、瞽虽是记录历史者，但不能等同后世的史官。

有文字记载的“史官”，始于商王朝。甲骨文已有“史”、“大（太）史”等官名，这表明此时已经出现了正式的史官。甲骨文还有“卿史”、“御史”、“卿事”、“御事”的记载，“史”“事”相通，“卿史”等都为掌书王的记注官，大略相当于后代所说的史官。据一些学者考证，甲骨文中“作册”、“内史”、“尹”、“卿事”、“御史”、“贞人”等都是史官官职名称。从文献记载来说，《尚书》、《左传》、《吕氏春秋》等都说到商代有“史”。《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也证明殷商时期的史官制度。商纣王无道，微子悲叹道：“今殷其典丧！”^②丧其典册，即丧失记录礼仪制度及国家史事的权力，意为亡国，说明商朝已有史官制度。商朝史官中，太史掌天官历法，亦掌重要占卜之事；贞人掌占卜，刻辞记事；作册掌典册。《殷墟

① 现存《国语》中《周语上》、《周语下》、《楚语上》分别记瞽史事。

② 《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

书契后编》26·2记录太史壬（壬为人名）代替商王祭祀，并进行占卜。

西周沿袭商朝史官制度并有发展。金文中有“史”字，《毛公鼎》有“太史寮”；《矢彝》有“卿士寮”；《散氏盘》有“史正仲农”的记载。金文中还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尹”“卿事”“御史”“贞人”等与商王朝相同的史官官职名称。

《周礼·春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史之名及他们职掌范围。太史掌守典册，约剂（契约一类文件）副本，负责天文历数，在参与祭祀、盟会、朝觐、出征、丧葬活动时掌卜筮与礼仪；小史为太史属官，掌周王族谱牒；内史则负责撰写册命、盟书等重要文件，在参与祭礼时则撰告天策、祭文、祝文，也负责出使诸侯国代周王进行赏赐、慰问；外史主管诸侯国之史；御史掌管法律文书，协助冢宰。王国维研究了西周官职后，指出诸史中“以内史为尊，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他卿所不及”^①。此外，见于文献的史官名称还有柱下史、守藏室史、微藏史、传史、女史等。从目前所存资料可见，至少东周时史官之职是世袭的，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太史兄弟三人事即是明证。

春秋时诸侯国仿照周王室制度，都设置史官，只是史官制度不如周王室完备而已。这些诸侯国史官名称有太史、小史、左史、外史、内史、御史、董史、侍史等，但没有一个诸侯国五史齐备。

从目前所存史料来看，商朝史官没有左、右或记事记言之分。而《礼记·玉藻》载西周史官职掌时说：“动则左史书之，

^① 《观堂集林》卷六《释史》。

言则右史书之。’^①《周礼》载五史，未分左右，也未说记言记事之区别，但从他们职掌区分来看，可能太史记动为左史，内史记言为右史。^②

第四节 史书编修的演变

一、史书编修在内容上的逐渐扩大

夏商周时期，记载历史的权力由属于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的史官掌握，因此史书所记述的历史活动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王”“余一人”及其政权的代表人物的言行与活动，极少记载人民大众的活动。流传至今的有关记录，有以记商王室占卜活动为主的卜辞，以记周王室贵族赏赐征伐等为主的金文，以记君主及其臣僚的训、诰、誓、命、谟之类以言为主的《尚书》，以记会盟、朝聘、战争之类记事为主的《春秋》，以及专记官制的《周礼》。

卜辞记事已有一定的程式。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并具备了历史记载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四个要素。它是史书的雏形，但还远不是史书。

商代对历史的记载还有典册。保存在《尚书》中的《盘庚》篇，采取了记言为主的形式，内容远比卜辞丰富。

至周代，钟鼎彝器上的铭文较之卜辞形式上有了变化。有的以记事为主，如《散氏盘》铭；有的以记言为主，如《毛公

^① 《汉书·艺文志》则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正好相反。

^② 参见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第16页。

鼎》铭。与卜辞和《尚书》中有关商代的篇章相比，钟鼎彝器上的铭文所记内容有所扩大。

《尚书》中载西周内容的篇章比较长，如《康诰》、《牧誓》以记言为主，《金縢》、《顾命》则以记事为主。从内容看，这些篇章涉及面更广。

《春秋》以记事为主，内容极其简略，一条史事少至仅记一字，最多的一条也不过 45 个字，其中还包括 19 个诸侯的名字。不过，相对卜辞、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和《尚书》来说，《春秋》所记内容已经大大扩展了。

《周礼》是以专记官制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对卜辞、金文、《尚书》、《春秋》以来记言记事体裁形式的一大突破。虽然《周礼》记事范围有所局限，但专记某一类史事，则能容纳相对较多的内容。

二、史书编修在记时方面的发展

史书记时是史书编修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时间是体现历史过程的重要因素，历法是历史记载的前提条件。但有时概念与历法，并不意味着历史的记事方式就很完备了。严格、准确的记事并形成叙述史事的定式，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甲骨文中，多数记述不够清楚。甲骨文记时的一般方法是：干支记日，置于文首；记年、月用数字，置于文后；顺序是日、月、年。但是在甲骨卜辞中，大多只记日或记日、月而不记年，较少将日、月、年完全记载清楚的。

金文记事承继了干支记日、数字记年月的传统，但记时仍然不很清楚，也未形成统一的定式。不少金文无记时，有记时的形式也不统一。《小孟鼎》铭开端记月、日，而后记年；《大孟鼎》铭开端只记月，最后才记年；《颂鼎》铭以年、月、日

顺序记叙，与甲骨文日、月、年顺序不同。显然，金文在记时形式上的多样化，反映了人们在记时问题上的探索。

《春秋》记时在金文基础上有了发展。它按年、时（季）、月、日顺序，将史事排列起来，并形成了定例，这就是晋代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中所说的“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这是计时法的一大飞跃，它反映了历史学家在整理零散史事的过程中终于找到了以年、时、月、日编排各种史事的比较完善的方法。《春秋》属于编年体史书，但不是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因为它缺乏史事具体过程与情节的记载，然而它已经有严格的记时系统，可以说它是编年体史书的雏形。而一旦在这种计时法下比较详细地记录下史事发展的具体过程与情节，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体裁——编年体便形成了。

第五节 夏商周春秋时期的史学思想

一、历史观的演变

1. 商代的天命史观

讨论史学思想当从商代开始，因为这一时期至少有甲骨文史料可资利用。

商人普遍持有神论，对历史的看法是天命史观。在商人看来，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王，而统治整个宇宙的至高无上者是“上帝”（或称帝、天），他决定着人类社会的一切。为了沟通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探求上帝的旨意，商人每事必卜，保存至今的甲骨卜辞就是他们占卜留存下来的记录。卜辞提到：“帝

令雨弗其足年？^①“癸卯帝其令风？^②“伐舌方，帝受我有？^③显然，这都是探求上帝旨意（即天命）的明证，充分证明商人持天命史观。

从文献记载里也能看出殷商时期的天命史观。《诗经·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诗经·长发》说：“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尚书·盘庚》篇载：“先王有服，恪谨天命”。显然，这里的天、帝、上帝都是人格神，商人强调自己王朝的建立是受天（上帝）之命的。

2. 西周信天命而重人事的观点

受命于“上帝”的商王朝，经历了600余年的历程后骤然灭亡了，取而代之的竟然是原来依附于商王朝的周族。周族在商后期逐渐兴起，到周武王时，他率军与商纣王军队在牧野大战，一举克商。历史的巨变迫使周的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的天命史观。

周人从殷商时代走来，本也视上帝为至上神，然而他们在继承中作了修正。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周公首先继承了天命观，承认上帝、天仍是至高无上的神，周代商立国，正是天命所归：“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④周公面对笃信天命的殷人，打着“天命”旗号，宣扬天意，来证明周王朝建立的合理性与权威性。然而，这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上帝过去“降而生商”，而现在不再保佑商王朝的原因。对此，周公提出

① 《殷墟书契前编》。

② 《殷墟文字乙编》。

③ 《殷契粹编》。

④ 《尚书·康诰》。